

• 新闻丛书 •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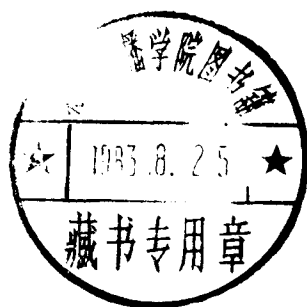
报人生涯 三十年

• 张友渔 著 •

重 庆 出 版 社

报人生涯三十年

张友渔 著

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二年·重庆

特约编辑：李漱秋 王 迪

封面设计：漆 平

报人生涯三十年

张友渔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(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)
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
达 县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5.625 插页4 字数132千
1982年12月第一版 1982年1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 1—12,000

书号：17114·9

定价：0.66 元

出 版 说 明

为了给新闻学的研究提供资料，给广大新闻工作者提供业务学习参考材料，我们计划陆续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辑的一套《新闻丛书》。

这套丛书的作者多半是我国新闻界的老前辈。丛书内容的一部分是现在写的当年回忆或追述，包括新闻战线各个方面的人或事，其间容或有不很切实之处，看法亦各自殊异；另一些资料则是几十年前在白区公开发表的文章，这些文章，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，现在看来，其中某些观点、论述或提法，难免有欠妥之处，但为保持其本来面目，我们均一律未予改动。

《新闻丛书》前言

《新闻丛书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继《新闻研究资料》后的又一套有关新闻方面的书籍。它是《新闻研究资料》的姊妹读物。

《新闻研究资料》自1979年8月创刊以来，历时三年。到今年年底，共出版了十六辑，330多万字。这是进行新闻研究工作和学习新闻工作经验的一笔巨大的财富，它涉及的内容，十分广泛。它有一批党的、进步的报纸和新闻团体的史料；有一批新闻界著名人物的史料；有一批革命前辈办报活动和办报经验的史料；有一批在中国近代、现代史上具有影响的报纸的史料，等等。所有这些材料，都为《新闻丛书》的编选工作提供了雄厚的基础。我们依据这些材料，按照不同的选题，经过补充修订、增添内容，使它成为一本内容充实丰富的专题著作。

此外，我们在编辑《新闻研究资料》的工作中，访问过许多新闻界的老年、中年和青年同志，其中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的新闻界前辈，他们将为这套丛书撰写回忆录；有积累了很多有价值资料的报刊史研究者，他们将为这套丛书编写专题史料；有对新闻采访、编辑、副刊编辑具有经验的记者、编辑，他们将为这套丛书写出有声有色的经验体会；有对新闻学作过深入探讨的研究工作者，他们将为这套丛书撰写专门著作。

所有这些情况说明，这套《新闻丛书》的选题范围是十分广泛

的,内容是非常丰富的。我们还将进一步广泛地约请新闻、文化、史学方面的同志,为这套丛书、为《新闻研究资料》丛刊撰写文章和著作。

我国的新闻历史悠久,新闻实践丰富,但新闻理论工作却显得薄弱。还没有引起新闻界本身应有的重视。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,是为了推动和促进新闻史料的积累、新闻实践的总结和新闻理论的研究。总的说,是为了我国新闻学的繁荣和发展。

感谢重庆出版社的同志们,他们为了我国新闻事业的提高和发展,支持这套丛书的出版,并在工作中给了我们很多帮助。

我们欢迎新闻、文化、史学方面的同志们和广大读者的支持、批评和帮助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

《新闻研究资料》编辑室

一九八二年八月

目 录

报人生涯三十年·····	(1)
从投稿人到总主笔·····	(20)
给《实报》写日本通讯·····	(38)
利用《时事新报》为我宣传·····	(45)
在《华商报》·····	(53)
三进《新华日报》·····	(60)
我解放前的斗争生活·····	(78)
何谓社论·····	(110)
新闻的性质和任务·····	(117)
由消息的真伪谈到天津《益世报》的失败 ·····	(125)
报纸与舆论之构成·····	(129)
报纸何以不完全用白话? ·····	(132)
报纸评论之起源·····	(141)
论统制新闻·····	(144)
报纸何以能煽动群众? ·····	(150)

论“机关报”.....	(157)
政治与报纸.....	(160)
日本报纸的文艺栏.....	(163)

附录

张友渔同志当年写社论.....	王 迪 (167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

后记.....	(172)
---------	---------

报人生涯三十年

我在50岁以前，有30年的时光断断续续地过着报人的生活。

我在少年时代便对报纸很有兴趣，喜欢读报。还在家乡私塾读书的时候，就曾给太原的报纸投过稿，开始同报界接触。到太原上中学后，经常给报纸写稿，担任特约访员，并曾代理过报馆的总编辑。到北京上大学后，和报纸工作有了更深的关系，曾担任过记者、编辑、社长等职务。一直到1949年，才完全脱离报人生活。

我所以从少年时代起，过了三十年报人生涯，并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有当时的历史背景、社会原因的，并且同家庭出身、本人生活有关联。为了说明问题，需要从我的童年时代说起。我的家乡是山西省灵石县。父亲张映南是一个穷秀才，靠教私塾为生。我出生于1899年1月（戊戌年十二月）。五岁开始跟着父亲在私塾读书。十一、二岁时，一边跟父亲读书，一边帮父亲教刚入私塾的小孩子。当时私塾所教的东西，主要是从启蒙的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起，到四书、五经以及古文、诗词等。我童年时，在父亲的教导督促下，在学习上曾下过一些苦功夫。我后来所以能够用文言给报纸写社论，虽得益于以后的学习，但也得益于童年

时期打下的基础。

我在童年时，对四书、五经是不得不读，并且不得不下苦功夫读，但我的兴趣，主要不在四书五经，而是杂书。我发生极大兴趣的最早读物，是我家里收藏的小说——第五才子书《水浒》。当时我分不清什么是文艺，什么是历史，把《水浒》当成历史读，并当成历史讲给同学们听。我所以喜欢读《水浒》，一是因为赞成梁山泊英雄们的“替天行道”；二是欣赏它的文笔流利。另一方面，一些笔记小说我也喜欢读，特别是《聊斋志异》。我给太原的报纸，投的第一篇稿子，就是摹仿《聊斋志异》体例、文笔的。以后，我读旧小说，可谓无所不读。

稍大，我读了康有为、梁启超不少政论文章，不仅佩服他们锋利的文笔，还接受了他们改良主义的思想，开始注意时事，用改良主义的思想分析政局，忧国忧民。我的一个堂兄在天津经商，经常把天津的《益世报》寄到家来。我开始从报纸上了解国际国内形势，眼界为之大开，对时事的关心超过了一切。这种关心，在当时一些青少年中相当普遍，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根源。清末，改革科举制度后，废除八股，考试“经义”，曾增加“策论”。因此，读书人里头，普遍注意研究政治时事。我当时还只是个十多岁的少年，但已成为我家乡中关心时局的知识青年队伍中的一员。阎锡山为标榜他的“模范省”，在山西各县都设了阅览室。我是灵石县阅览室的常客。看报、思考时局问题，成了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。

这样，我从青少年时代，便关心政治，重视报纸。由于我当时的头脑中充满着康、梁改良主义思想，对报纸性质的认识也是超阶级的，以为可以通过报纸揭露社会黑暗，主持正义，改良国家。太原出版了一张八开小报《山西画报》，是用很薄的油光纸印的，一面光滑，一面麻，只能在光滑的一面印刷。内容有新闻、小故事和画。我写的揭露社会黑暗的第一篇稿子便登在《山西画报》上。灵石

县发生了一件诈骗案，我摹仿《聊斋志异》中的《念秧》，写了篇《新念秧》寄给了《山西画报》，希望通过《山西画报》揭露批判这种事。《山西画报》给登出来了，给了我极大的鼓舞。这篇稿子可以说是我三十年新闻生活的前奏。我开始新闻生活，是1918年到太原上山西第一师范学校的时候。

1918年我到太原投考中学。当时太原办得好的中等学校有两个，省立第一中学和省立第一师范。这两个学校，我都考取了。因为第一师范是官费，管吃、住，免费供应课本，每年还发两套制服、一件棉大衣，我就进了第一师范学校。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有给报纸投稿的风气，投稿内容多为社会新闻。许多学生靠给报纸投稿所得稿酬补助生活费用。稿酬每条消息一毛、一毛五或两毛。那时生活费用很低，一天有一、二毛钱零用就够了。当时太原除了《山西画报》外，有三家大报，一家小报。三家大报，一是《山西日报》，山西省政府的机关报；二是《并州新报》，属阎锡山系统的报，不过政府色彩不浓；三是《晋阳日报》，阎锡山系统里晋南一派的报纸，政府色彩更轻一些。一家小报叫《唐风报》，是第一师范学校教员杨濂甫办的。杨濂甫是山西省议会议员，敢说话，人称他“大议员”。他这张报在政治上属于独立派，每天主要登通讯社的国内大事，只有一、二条本地新闻。《山西日报》登本地新闻多，稿酬也多点。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们大都给《山西日报》投稿。有人只为赚稿费，随便编造新闻，或把过去的旧闻改头换面当成新闻。我主要是想通过报纸揭露黑暗，主持正义，改良社会，所以写我耳闻目睹的事实，从不编造。有一次，我把灵石县知事赵某贪脏枉法，错断了案子的事写成稿，登在了《山西日报》上。县知事很不高兴，一个亲戚警告我父亲说：“古人说过，‘灭门令尹’。得罪了县知事，全家有危险。”父亲给我来信，劝我不要再写这一类的新闻。我还是继续写。因为我写的是事实，又是《山西日报》登

的,县知事也没敢把我和我家怎样。我写的稿符合事实,得到报馆的信任,差不多每条都被采用。我写得比较多,报馆采用得也多。不久,《山西日报》、《并州新报》都请我当特约访员,都不再按稿件条数付酬,而是每月固定给我五块钱工资。当时一个小学教员每月工资不过七、八元。学校管我的吃、住、课本、衣服,每月的这些收入,我多半用来买书。

一边上学,一边当特约访员。新闻题材从哪里来呢?一部分是自己在学校耳闻目睹的教育界新闻,大量题材是我利用休息时间、别人去玩的时间进行采访得来的。和同学们聊天,从他们的家信及来看望他们的同乡谈话中,了解到山西各地不少情况。每星期三、六下午和星期天,我到社会上调查。开始是到各机关门口走走,例如到警察厅门口,看看门口的揭示牌上写着什么案子,如何处理;并且访问在各机关的亲友,了解情况,借阅文件。后来我参加了学生运动、文化运动,消息的来源就开阔了。那时,我是一个爱国的、民主主义者,没接触过马克思主义,思想上既受康有为、梁启超以至胡适等的改良主义的影响,也受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影响,还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有兴趣。总之,思想是复杂的、矛盾的。但由于我对反日运动、民主运动、新文化运动是积极的,并且学习成绩优秀,文章写得不错,品行也被评为甲等,所以同学们就把我选为学生会会长,后又选为山西省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。在“五四”运动中我成为山西学生界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领导成员之一。对学生运动情况了解得多,写了不少反映学生运动和抵制日货的报道,颇为各报重视。

除给报纸写稿外,我在学校还和同学高沐鸿等成立了共进学社,出了个叫《共鸣》的刊物。给这个刊物写文章的,有信仰共产主义的,有信仰各种“社会主义”的,有信仰三民主义的,也有胡适派、康梁派。文章的观点只要是反帝反封建的,《共鸣》就采用。

这个时候，太原学术界的一些提倡社会主义的大学教授如邓初民等，组织了一个新觉路社，出版的刊物叫《新觉路》。我也被吸收参加了这个组织，曾在《新觉路》发表了提倡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文。

这一时期，我还给报纸的副刊写点东西。曾给《晋阳日报》、《唐风报》写些旧体诗。《并州新报》还连载了我的《诗经解释》，每天一段。我这个解释一反朱子集传的旧说，发挥自己的见解，还比较受欢迎。

我和《并州新报》的联系较多，关系也较好，稿件被采用的也较多，稿酬也较优，初被聘为特约记者时，每月工资给五、六块钱，后增至十元。有一次，这个报的总编辑郭乾甫回家探亲，还让我代理过一个时期的总编辑。在第一师范毕业前，我还被共进学社的同学拉到山西的国民党办的《民报》当了一段时期的编辑，编社会新闻。

1923年暑假，山西省第一师范学校组织本届毕业生到北京参观，我来到北京。参观后，我留在北京考大学，考上了国立法政大学。从此，又在北京开始了一边当学生、一边给报纸写稿的生活。我上大学的生活费用完全靠自己写稿来解决。我留在北京后，《并州新报》就让我当驻京记者，每月工资十五元。任务是：一、代订联合通信社和神州通信社的通讯稿，每天用快邮寄去；二、是每天打十来个字的电报。十来个字中，有时包含好几条新闻，例如奉系军阀张作霖于某月一日离北京返回奉天，就在电报中以“奉张东（电报用语一日即东）返奉”五个字发一条新闻。《并州新报》从此有了自己的北京专电，文字上稍作补充，用头号字排在重要位置。

当时有钱的大学生每月要花一百多元。我生活得很省俭，早餐只吃烤白薯、喝粥，中午和晚上来半斤面条或烙饼，一碗白菜汤或豆腐汤，一日三餐只花一毛钱。初来北京时，住在不花房租

的灵石会馆，每天上学和到电报局发电报，到前门车站邮局寄通讯稿，都是走路。但是要买煤生炉子，要购置点衣服，要买书，光靠《并州新报》每月给的十五块钱是不够的。我必须给别的报纸写稿。但我给北京各报没有写短新闻的可能。因为北京各报都有自己的专业记者，有专门搞政治新闻的，有专门搞社会新闻的，有专门搞教育新闻的。于是，我开始给报纸写杂文。白天去上课，晚上写杂文。把杂文投给两家报纸，一个是《东方时报》的中文版；一个是《世界晚报》。《东方时报》中文版总编辑叫陆少游，我写去的杂文，他认为不错。原来每周一篇，稿费五、六角。不久，就请我作特约撰稿人，每月固定工资15元。《世界晚报》的文艺版“夜光”，主编是张恨水。我的杂文登在“夜光”上，每篇稿酬也是五、六角。1925年2月《世界日报》登了一条为文艺版招考特约撰稿人的广告，不少人应考。我被录用，每月工资也是15元。我每月有了好几十块钱的收入，上大学的生活不成问题了。

连我自己也没想到，从此，我和《世界日报》的关系长达十年之久。我来到北京后，思想上起了变化，逐渐摆脱康梁以至胡适一派改良主义的影响，而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，但对马克思主义还很不理解，只相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。在我上的学校里，学生分成了两派：一派是保守的，拥护军阀政府；一派是革命的，反对军阀政府。革命派的里头又分了两派：国民党一派，共产党一派。我开始参加了国民党。在国民党分化过程中，我成为国民党左派。这时，我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，对马克思主义有所理解，同共产党有了联系。1927年，在南方，蒋介石背叛革命，屠杀共产党；在北方，张作霖镇压革命运动，李大钊同志牺牲。我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，这年六月，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，我加入了共产党。我开始给《世界晚报》、《世界日报》写杂文时，还站在国民党立场，对现实不满，但看不到共产主义目标，政治上犹疑

徬徨，感情上忧伤。我常用“忧疑”二字作为笔名，发表杂文。大量的杂文是揭发社会的黑暗面，为被压迫、被宰割的人民鸣不平，抒发心中的郁闷、忧愁和徬徨。后来，我把笔名“忧疑”改成“有疑”，通过杂文表示我对军阀政府的不信任，对它鱼肉人民行径的指责。成舍我要使《世界日报》在知识界中有影响，就需要在报纸上发表对现实不满、批评军阀政府的文章。我的杂文为《世界日报》所需要；我能通过《世界日报》抒发我的情绪，因此，我和《世界日报》的关系就密切了。不久，成舍我请我到《世界日报》当教育编辑。我白天去学校上课，晚上去《世界日报》上班。同时，还给《世界日报》、《世界晚报》写杂文。

这个时期，我还担任上海《申报》的教育记者、武汉《中山日报》的驻京记者。有一个叫龚德柏的国家主义派人物，原来和成舍我合作办《世界晚报》，因意见不合而退出《世界晚报》，另办了个《大同晚报》。龚德柏为了和《世界晚报》竞争，拉了我和胡春冰去编《大同晚报》文艺版。因为他有反军阀政府的一面，所以在《世界晚报》可以发表的作品，在《大同晚报》也同样可以发表。我写的杂文、短篇小说，揭露社会黑暗，抨击军阀政府，他不反对。北伐中，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，龚德柏到南京去办《救国日报》，托一个姓罗的给他管着《大同晚报》。姓罗的忙着自己办一个超然通讯社，对《大同晚报》不多管，把整个《大同晚报》的编辑工作都交给我。我就照我的意见来办《大同晚报》。《大同晚报》很快变了模样，立场、语言都左了。《世界日报》的经理吴范寰对我开玩笑，说我篡夺了《大同晚报》的权。我笑着回答说：“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。”龚德柏在南京看到《大同晚报》变了模样，就把《大同晚报》停办了。

这个时期，我已经改变了过去对报纸的超阶级的认识。虽然同时在《世界日报》、《世界晚报》、《大同晚报》三家报馆工作，又担任着上海、武汉两家报馆的记者，总感到在别人的报纸上发表自

己的意见是有限制的。正好我有机会自己办一张报。这就是我头一次为我们党办起来的,作为合法斗争工具的报纸——《国民晚报》。这以前,我们党曾想利用一张在民国初年很出名,当时已经衰落下来的《北京日报》,为我们作宣传。党组织通过公开身份是国会议员的秘密共产党员胡鄂公找我,商量如何活动来接办《北京日报》。结果没有办成,我一直引为憾事。《国民晚报》本来是国民党的报纸,由国民党右派罗敦伟创办,后来移交给当时是国民党左派的黄少谷来办。1927年上半年,李大钊同志介绍黄少谷去冯玉祥那里工作。黄少谷临走时,要盘掉这张报。黄少谷原来的资本是三百元。我便和《世界日报》馆里两个政治上进步的同事张友鸾、左笑鸿,三人各出一百元,买了下来。这个报馆设在西单报子街,机构简单,除我们三个人外,只有一个事务人员。张友鸾是《世界日报》总编辑,左笑鸿是《世界日报》采访部主任、社会版编辑。他俩工作忙,《国民晚报》的编辑工作主要由我来做。晚上,我到《世界日报》编教育版。上午,编《大同晚报》和《国民晚报》。下午,给《世界晚报》写杂文,还要完成上海、武汉两家报纸的通讯工作。每天上午十点以前,一定赶到报子街的《国民晚报》编报,十二点左右赶到六部口东栓马桩编《大同晚报》。午饭请工友到西单小饭馆买几个烧饼、一碗鸡蛋汤、一碟小菜,边吃边接电话,边编新闻稿,真是“五官并用”。

继蒋介石发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,汪精卫也叛变革命,政治形势变得很坏。北平的《世界日报》、《世界晚报》,由成舍我的老婆杨璠管理。她向我们提出,我们要在《世界日报》工作,就不要办《国民晚报》;要办《国民晚报》,就不要在《世界日报》工作。我坚持把《国民晚报》办下去,就离开了《世界日报》(包括《世界晚报》)。我另约了两人,一个是武鉴(即武新宇),当时是师范大学学生,共产主义青年团员。另一个是陈显文(后叫陈高佣),当时是中共党员

(三十年代在上海被捕叛变),《中华日报》的编辑。《国民晚报》从报子街搬到宣外大街的茶食胡同的一个只有三、四间房的小院子里。这时,我已入党。《国民晚报》便成为地下市委直接领导下的进行合法斗争的工具。我任社长,又是主要编辑。市委每天派交通罗采五和朝鲜籍党员谢某(名字,想不起了)送有关宣传的材料和指示给我,我用合法形式编成新闻,撰写评论,在《国民晚报》上发表。同时,我把每天了解到的情报交他们带回市委。新闻来源,除了党供给的材料以外,自己还要采访,或从日本报纸翻译(我在中学学英文,在大学也学英文,第二外国语是学的日文),主要采用通讯社的新闻稿。当时的通讯社,一般都在晚间发重要新闻稿,午前不发稿,有的只发少量一般消息。在神州通讯社当记者的管翼贤,自己创办了个时闻通讯社。他想了个办法,在晚报截稿前,用电话把当天的重要新闻提供给晚报。这对《国民晚报》是很有帮助的。

1927年11月,我被国民党逮捕入狱,《国民晚报》也停办了。

1928年3月,我被保释出狱,离开北京去天津,开始仍作报纸工作。这个时期的实践,彻底粉碎了我早年认为报纸是超阶级的思想。我先在陆少游办的京津通讯社工作,主要是把日文报纸上关于北伐战争的报道翻译成中文稿。因为我译发了一条消息,天津的统治者直系军阀褚玉璞认为对他不利,声言要封闭京津通讯社。吓得陆少游不敢让我再留在他那里。我又到熊少豪办的汉文《泰晤士晚报》当总编辑。在《泰晤士晚报》,有两件事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一件事是,我发了一条消息对中原百货公司不利,熊少豪很不高兴,怕得罪了大广告主顾,赶紧去中原百货公司道歉。另一件事是,中国各报不敢登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炸死的消息。《泰晤士晚报》在法租界,军阀政府不敢惹。我把这消息在《泰晤士晚报》登出来,震动一时,销路大增。熊少豪十分高兴。这几件事,